第三章　睦鄰外交政策背景與意涵

自中國在 2300 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因社會與地域間，正處於傳統「王道」封建體制遭受衝擊，在勢所趨下各家學說暢行，而透過各國諸侯採用與時間過濾下，諸家學說中對外關係立論，逐漸形成二類主流：以法家爲主的「霸道」外交思想及儒家睦鄰思想爲特色的「王道」外交思想。[1]自此後，不同時期的統治者們對它或推崇追隨亦或者鄙視，政治思想家是藉以發展擴張亦或批判，但兩家學說成爲中國傳統外交思想主軸卻是明確的；而在中國歷代外交實踐中，逐漸轉化爲以王道爲主，霸道爲輔的外交思想和政策，有時也相互爲用。中共的外交思想和政策的產生亦受此歷史傳統影響，中共的睦鄰外交也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逐漸建立起其思想體系。

冷戰結束後，中共開始受到全球和解的結構性觀念趨勢影響，改變其身分與相對調整其國家發展的真正利益。鄧小平以戰略的觀點，判斷世界經濟的緊密融合與未來國際將以經濟發展爲國家核心利益的基本趨勢，論述了中共必需堅持長期的努力才能達成的發展國家核心利益（經濟力量）。他說：「我們擁有各種有利條件，一定能夠趕上世界上的先進國家；但是也要認識到，爲了縮短和消除兩三個世紀至少一個多世紀所造成的差距，必需下長期奮鬥的決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們不能不提倡和實行艱苦創業」。[2]鄧小平以較爲務實合理的態度來評估中共自身發展的戰略，了解到把握世界政策多極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兩種趨勢的重要性，促使中共在各層面更緊密的與世界接軌。不僅與世界期待後冷戰時期和解的期待接軌，也將中共的利益與世界接軌，這對於中共在其發展機遇期具有關鍵性與穩定性的戰略性影響。

其後接替鄧小平領導路線的江澤民也認爲：「首先要明確，對外工作的首要任務是爭取和平，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爲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改革開放，在國內需要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在國際上需要一個和平環境。爲了在國際爭取一個和平環境，中共發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處理好與世界各大國的關係，努力推進多極化趨勢的發展；堅持睦鄰友好，處

---

[1] 有關王霸觀念的歷史演變，中國大陸史學家嵇文甫解釋道：王與霸本來不是兩種治法，兩種主義，而只是地位上的區別。王即天子，霸即伯，指諸侯之長說。春秋時代，只講霸諸侯，不講王天下。孔子對於霸者並沒有菲薄的意思，他也並沒有標榜出與霸道對立的王道。到孟子就不然了。他一方面爲當時大一統的趨勢所刺激，而主張定於一；故只講王天下，不講霸諸侯；只教人帝制自爲，不教人當什麼諸侯之長，這和孔子的思想已顯有差異。另一方面他把王霸二字賦予一種新意義，不從地位上區別，而從性質上區別，王道霸道，判然兩途，於是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占中心地位的王霸論就是在這種背景出現了。嵇文甫，《嵇文甫文集》（河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82 頁。

[2]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260 。

理好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進一步加強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權益；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3]從其睦鄰外交的發展脈絡觀察，中共受到國際共同觀念的結構性的限制與改變，來制定其不同階段國家戰略；相對來說，中共國家利益對於一國的外交行爲也逐漸有其戰略性指導的反饋。

現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 2004 年 4 月在博鰲論壇上所提出的「開放的亞洲主義」表示中國的發展是亞洲的機遇，堅持與鄰爲善、以鄰爲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奉行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著力加強同亞洲各國互信合作，積極推動緩解熱點問題，努力維護亞洲的和平與安寧，此可作爲中共睦鄰外交的最佳註腳；[4] 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第八次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上發表題爲《加強合作，互惠共贏》的講話，亦堅持開放的地區主義。[5]

第一節　睦鄰外交推動背景因素

自清中葉「條約外交」以來，外有列強不斷侵擾，內則地方分據，戰亂不休；經濟發展緩慢、外交軟弱，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取得世界對其大國地位的認定，擺脫屈辱的近代外交史。然而隨即爆發國共內戰，中共取得中國大陸的實際統治權；由於中國經歷戰爭災難頻繁，中共政權成立後，以毛澤東爲代表的第一代領導對中國的外交思想和傳統進行分析和總結，融合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與繼承部分中國政治文化的傳統。

1949 年建政以來，作爲革命政權，由於強烈的民族主義與共產意識形態，與鄰國發生許多邊界的衝突；然由於當時中共國內仍有繁多的問題待解，外又因韓戰遭西方圍堵，爲了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乃在睦鄰外交思維上融合中國傳統外交的和平性及務實性，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目的在凸顯北京對外立場與作爲，不會大欺小、強凌弱，彼此關係奠立在平等、互惠基礎上。中共總理周恩來在 1953 年 12 月 31 日接見印度代表團時提出發展相互關係一項原則，即「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1954 年這一原則又在當年先後發表的中印、中緬兩國總理聯合聲明中得到了正式確認，並成爲其後中共睦鄰外交的基礎原則。

---

[3] 任慧文，〈江澤民談世界兩化下的中國外交〉，香港《信報》，1998 年 8 月 29 日。

[4] 〈中國的發展亞洲的機遇〉，《新華網》，2004 年 4 月 24 日。
http ://www.hq.xinhuanet.com/boao2004/2004-04/25/content 2031336.htmt

[5] 《新華網》，2004 年 11 月 29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ll/29/content_2274824.htm

從 1950 年參與韓戰起，中共與鄰國曾發生多次邊境衝突，70 年代末還出兵越南；惟當鄧小平掌權，結束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冒進」、「革命」施政，採行改革開放政策，在短暫「懲越行動」，即積極改善與鄰國關係，透過外交談判，逐步改善與印度、越南及蘇聯的緊張關係，80 年代後期，這些國家領導人已紛赴大陸訪問；在距前一位總理訪華相隔 34 年後，1988 年印度總理甘地訪問北京；1989 年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訪中，結束兩國冷戰；越南總書記杜梅亦於 1991 年訪問大陸，完成雙邊關係正常化。[6]而中共經濟與外交拓展成效，於 1978 年至 1989 年間，在聯合中共牽制蘇聯的戰略下，獲得歐美等西方國家大力支持；中共亦放低意識形態作爲，全力發展經濟，努力改善與西方及周邊國家關係，並減緩台海軍事對峙緊張，充分展現外交爲經濟建設服務的思維。鄧小平認爲：「搞現代化就是要加快步伐，搞富的社會主義，不是搞窮的社會主義」。[7]確立了中共經濟發展是中共的核心利益；「由於現代科技發展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驚人程度，在現代化生產中，生產社會化日益成爲國際化已是生產力發展的不可阻擋、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只要世界生產力繼續迅速發展，世界經濟一體化將成爲世界歷史和國際關係的必然趨勢，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繫是這種歷史趨勢的必然結果。聯繫日益緊密的世界，逐漸成爲一體，經濟和科技在國際政策、軍事和外交等方面發揮著日益重要甚至關鍵性的作用。世界經濟日益一體化，利益相互滲透，密不可分」。[8]從中共角度看，爭取周邊情勢的穩定與和平，乃是爲了爭取時間，發展國內經濟建設。

另外爲配合經濟建設，北京也積極參與各項組織融入國際社會中。1971 年中共進入聯合國，當時在意識形態影響下並未積極參與聯合國所屬相關機構，直至改革開放始申請加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1984 年加入國際原子能總署，隨後加入國際刑警組織、亞洲開發銀行等，1986 年申請加入關貿總協（GATT）。

壹、建政至改革開放前階段

1953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接見印度政府代表團，就兩國在西藏地方的劃界問題舉行談判，雙方於1954年4月29日簽訂「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中共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式寫入「協定」的序言，其內容爲「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

---

[6] 田曾佩主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 年），頁 97。

[7] 冷融、汪作玲主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鄧小平年譜 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2004 年），頁 126。

[8] 〈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收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21。

」五原則。[9]爾後中共藉此原則向各國大力推行睦鄰友好政策，如：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與1955年的亞非會議，周恩來在會議期間透過穿梭外交，在會中倡議「和平共處五原則」，並贏得與會各國的支持，會後還將之融入「最後公報」的「十項原則」[10]內，中共稱此「萬隆精神」爲其和平共處外交的一大成功，至此，「和平共處五原則」成爲中共對外交往之基調。

事實上，「和平共處五原則」乃承襲自中國古代王道思想之傳統，而就其內涵來看，除與「聯合國憲章」之精神相通外，[11]還可成爲中共睦鄰外交之理論基礎，綜觀「和平共處五原則」展現與實踐在睦鄰外交時的具體方針爲：

（一）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和領土完整是睦鄰外交之前提。

（二）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是睦鄰外交之內容。

（三）平等互利則是睦鄰外交之指導原則。[12]

其後，由於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運動與獨立風潮之迭起，[13]中共針對第三世界國家彼此間的差異性，定出「求同存異」方針，其內涵如周恩來所言：「我們亞非各國人民爭取自由和獨立的過程是不同的，但是我們爭取和鞏固各自的自由和獨立的意志是一致的。不管我們各國的情況如何不同，我們大多數國家都需要克服殖民主義統治後所造成的落後狀態」。[14]中共藉由和第三世界國家相似的背景，運用睦鄰外交來拉近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用以換取更多的盟邦與友誼。

然在改革開放前，中共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不甚和睦，例如：1950年中共介入韓戰、1954年及1958年發生兩次台海戰役、[15] 1962年也與印度發生兩次邊境武

---

[9] 1954 年 6 月後，中止「平等互惠」改爲「平等互利」；1955 年亞非會議期間，又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改爲「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徐成芳，《和平方略－中國外交策略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2000 年），頁 81-82。

[10] 方連慶等編，《戰後國際關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281-282。

[11] 「聯合國憲章」的七大原則是：會員國主權平等、真誠地履行國際義務、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禁止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集體協助、確保非會員國遵守上述原則、不干涉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內部管轄之事項。黃婉玲，《電子六法全書》。http://www.6law.idv.tw/law2/%E8%81%AF%E5%90%88%E5%9C%8B%E6%86%B2%E7%AB%A.doc

[12] 陳向陽，《中國睦鄰外交》，頁 106。

[13] 1957 年開羅召開「亞非人民團結會議」，1961 年於南斯拉夫的貝爾格勒召開的第一屆「不結盟（non-alignment）大會」，第三世界國家開始利用亞非國家逐漸佔有的數量優勢，藉由聯合國大會中的平等表決機制，於 1960 年通過「給予殖民地國家與人民獨立的宣言」，譴責所有外國征服與剝削其他民族的行爲，並主張立即採取措施將權力轉移給被殖民者。王曾才，《世界現代史》（台北：三民書局，1999 年），頁 206-207。

[14] 周恩來，《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年），頁 113-114。

[15] 依國際政治學者對台海危機的劃分，第一次台海危機是 1954 年底到 1955 年初，當時中共砲擊金門（1954 年 9 月 3 日），攻取一江山（1955 年 1 月 21 日）迫使我國國軍從大陳島撤退（1955 年 2 月 26 日）；第二次台海危機是 1958 年 8 月 23 日到 10 月 5 日的「八二三砲戰」。羅慶生、許競任，《國家安全概論》（台北：全華出版社，2004 年），頁 92。

裝衝突、[16] 1968年與蘇聯發生「珍寶島事件」至1979年因柬埔寨問題對越南發動了「懲越戰爭」；除此外1965年至1968年間，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使得極左思潮波及周邊鄰國，諸如：在1967年時，印度發生農民武裝暴動，中共的人民日報還發表題爲「印度的春雷」之社論，加以喝彩；在尼泊爾首都發表的「中國成就展覽會」上發生了騷亂事件，導致兩國關係緊張；另在緬甸，因華僑學生佩帶毛澤東像章，故而引起反華事件；以及在北京發生了「三砸一燒」事件，亦即砸毀印度、緬甸、印尼三國駐中共大使館與火燒英國代辦處等事件。[17] 凡此均顯示出此時期中共的睦鄰外交政策，不論在政策宣示上既談不上睦鄰外交，在實質效果上也未達到睦鄰成果，而僅止於以「和平」作爲口頭上的政策宣示，在實踐上仍與睦鄰外交有一段距離。[18]

此階段中共的睦鄰外交政策，乃以「和平共處五原則」作爲其對外之張本。不過在 50 年代期間，尚未明白且廣泛使用「睦鄰」或「睦鄰友好」等字眼來形容中共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此時期中共領導人在對外談話或締結條約時，多是以強調或宣示「和平」的概念爲主；[19]及至 60、70 年代，由於中共與東南亞國家在意識形態、共產主義革命輸出、邊界領土主權以及華僑雙重國籍等問題上，有較多歧見且彼此關係尚未完全改善，是故在東南亞地區，除了社會主義國家外，[20]中共並未與周邊其他國家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這使得中共這種尋求與周邊國家和平共處爲主軸的「睦鄰外交」政策，在政策上既未明白表述，在實踐上也未完全得到落實。

貳、鄧小平主政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主導下的內外政策，有一套核心理念做基礎，以現代化作爲國家發展的目標。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首先確立改革開放的路線，外交隨之出現重大轉折。從以往「戰爭與革命」的對外關係，轉化爲以「和平與發展」爲主的對外關係。毛澤東時代以意識形態劃分敵我，鄧小平時代則實用主義當道。[21]鄧小平以爲，建設現代化的國家須先解放生產力。他說，「人民生活長期停滯在很低的水平，不能叫社會主義」「貧窮不能叫社會主義

---

[16] 中共和印度邊界糾紛有：西段、中段和東段三部分，於 1962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5 及 11 月 16 至 22 日共發生二次武裝衝突。張虎，《剖析中共對外戰爭》（台北：幼獅出版社，1996 年），頁 111-113。

[17] 陳向陽，《中國睦鄰外交》，頁 206。

[18] 許志嘉，〈中共睦鄰外交政策：意涵、策略與運作〉，全球化與中共發展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94 年 12 月 25 日），頁 3。

[19] 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頁 143-145。

[20] 中共與中南半島的社會主義國家關係良好，均已建立邦交，至於在邊界問題上，和緬甸於 1960 年 10 月 1 日簽署「中緬邊界條約」劃定兩國之疆界。陳向陽，《中國睦鄰外交》，頁 186-187。

[21] 曲星，《中國外交五十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7。

，更不是共產主義」。中國唯有開放門戶，發展生產力，提升人民生活，國家始能強盛，強調馬克斯的生產力學說，刻意淡化階級鬥爭的立場。同時認爲中國要經濟改革，須有和平的國際環境，沒有和平的國際環境，就無餘力推動現代化建設。他說：「中國要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把我國建設成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們需要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也正在努力創造和維護這個和平環境。經濟建設是我們的大局，一切都要服從這個大局」並指出「對內經濟搞活，對外經濟開放，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個長期的政策，最少50年到70年不會變。…即使是變，也只能變得更加開放」。[22]此期間，中共建立經濟特區，積極參與國際與區域性組織，加速與世界接軌，以有效汲取西方資金、技術，但也逐步加深對外依賴。[23]

以鄧小平爲代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針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新變化，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觀念與利益」的戰略論斷，主要是中共國內急需務實的滿足民生以及經濟的需求，並以此爲前提賦予中共睦鄰外交政策新的內涵並且具體的實踐。主要包括：

（一）不結盟並且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倡導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與各鄰國發展關係。認爲「中共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既不依附於某一大國，也不搞等距離外交…是真正的不結盟」。[24]他強調中共永遠不稱霸，也反對任何國家和集團搞霸權主義。

（二）淡化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差異，利用和平手段，實事求是地解決與鄰國之間存在的歷史遺留問題。認爲應從國家自身戰略利益，考慮國與國間的關係，同時也要尊重對方的利益，不要去計較歷史恩怨和社會制度差異，平等對待各鄰國。提出「忘記過去，開闢未來」，主張新型中俄關係發展的建立，與處理南海主權爭議所提「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建議，具體和緩和推動與東南亞國家間睦鄰友好關係。

（三）全方位開放，以經濟合作、共同發展來充實傳統的睦鄰友好關係。認爲「關起門搞建設很難發展起來」，要求中共改革開放以發展自己。針對中共的周邊既有經濟發達的日本，也有軍事力量強大的俄羅斯，還有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他要求與各鄰國全面發展政治和經濟合作，以互利爲基礎，謀求雙贏和共贏局面。

---

[22]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79。

[23] 高朗，〈後冷戰時期中共外交政策之變與不變〉，《政治科學論叢》，第 21 期（2004 年 9 月）頁 26。

[24]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129。

睦鄰外交的構建，除中共自身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傳統與戰略思維外，其物質條件也建構了中共對於自身在國際上身分與利益的定位。鄧小平曾說過：「中國有中國的問題，有自己的條件，因爲我們人口多。即使我們的生產能力和總產值達到了美國的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跟西方的水平還差一個很大的距離。說趕上西方，就是比較接近，至少還要 50 年。這不是客氣話，這是一種清醒的估計」。[25]也曾評論到中共科技的落後程度「我們現在的生產技術水平是什麼狀況？幾億人口搞飯吃，糧食問題還沒有真正過關。我們鋼鐵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只有國外先進水平的幾十分之一。新興工業的差距就更大了。在這方面不用說落後一二十年，即使落後八年十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距」。[26]

因此，中共國內先天體質條件的不良，也促使中共必需以解決國內問題與發展實力爲首要課題，且改革開放與冷戰後的經濟的成長並未完全解決上述中共國內物質條件的弱點，而且中共社會經濟嚴重差異化與政治改革等問題、社會動亂問題、國企改革的嚴重困難等，[27]都讓中共必需在後冷戰時期持續以內政改革作爲國家施政的前提。再者中共經濟的發展主要來自國外的資本投資與技術移轉，在自身工業基礎與研究發展薄弱、仰賴大量國外移入的情況下，外資仍有可能因爲中共投資條件惡化與市場因素而選擇比較利益較佳的地區，這都是中共必需防患的課題，解決國內問題成爲中共目前國家發展經濟實力首要的問題。因此，基於中共國內的物質條件，如何改善體質與繼續吸引外資，確保中共的國家實力與安全，成爲中共這個仍是開發中的國家是否能達到中度開發國家的主要條件，[28]也關係到中共的共產黨政權是否能存續的關鍵性因素，因此實踐睦鄰外交爲穩定發展環境的必要戰略。

由此看出，中共對外關係必須服從經濟建設的大局，以維繫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環境。在鄧小平思想指引下，多年來中共外交的核心任務，始終未變。儘管到了後鄧時代，外交目標不是拓展對外的影響力，而是著眼國內建設的需要。所不同的是，後冷戰時期，國際環境巨變，中共外交策略面臨新挑戰，必須調整，以穩定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因此，中共對外關係深受鄧小平現代化理念的影響，該項理念經過多年發展，早已形成制度與組織文化，進而發展成中共的利益結構。即使到後冷戰時期，北京並未野心勃勃地拓展對外影響力，反努力維繫周邊環境之和平與穩定，以免妨害經濟建設。

---

[25] 冷融、汪作玲主編，《鄧小平年譜 1975—1997》，頁 21。

[26] 〈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 90。

[27] 王鵬令，〈從趙紫陽到江澤民：中國改革戰略的變遷和連續〉，《當代中國研究》，第 61 期（1998 年 2 月 4 日），頁 61。

[28] 張顯超，〈有關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之重要摘述與評論〉，《國立中山大學期刊》（1999 年 2 月 9 日）。http://www.future-china.org/fcn/ideas/fcs990209.htm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推動「睦鄰外交」的文字開始出現在中共的政策文件中。1983年趙紫陽在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進行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外交工作時指出「中國一向關心同自己的鄰近國家保持和發展睦鄰關係」；[29]1984年趙紫陽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度強調，「我們特別重視發展同鄰近國家的睦鄰關係，因爲這不僅關係到我國的安全和發展，而且影響到整個亞洲的和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和穩定」；[30]1986年3月中共第六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所通過的「關於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趙紫陽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時在這項外交政策總方針的主要內容和十項基本原則中，亦提到要發展同各國友好合作之文字。[31] 這是中共高層首次點明重視睦鄰關係，並將睦鄰工作提到中央文件外交政策的論述中，在政策文件中突顯「睦鄰」的概念，不過此時的睦鄰外交仍未成爲中共外交政策論述的重點，反而是強調「和平與發展」的說法，例如：1985年3月，鄧小平說：「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32]基此，中共採取獨立自主外交，並與周邊國家逐漸改善關係，進一步實現關係的正常化。[33]

總之，中共在政策宣示上已具體提出睦鄰外交的概念，實際運作上也開始逐步推動睦鄰工作，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改善與促進周邊鄰國的關係，回復或實現雙方關係正常化：

中日雙方於1972年建交，1978年簽定「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此後兩國高層互訪頻繁，日本更長期提供中共貸款；[34] 1988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問中共，雙方協商建立關於邊界問題的聯合小組；1989年實現與蘇聯關係的正常化；[35]印尼則於1990年8月8日與中共復交，其後是新加坡，1991年汶萊與中共建交，中共完成與所有東協國家之關係正常化。

---

[29] 趙紫陽，〈政府工作報告〉，《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353。

[30] 趙紫陽，〈政府工作報告〉，頁 499。

[31] 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北：生智出版社，2004 年），頁 65。

[32] 鄧小平，〈和平和發展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353。

[33] 鄧小平指出，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中國同任何國家沒有結盟關係，完全採取獨立自主的政策，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57。

[34] 田曾佩主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 年），頁 371-376。

[35] 1985 年蘇聯戈巴契夫上台後，於 1986 年 7 月 28 日在海參崴發表願意改善中蘇關係的講話，後於 1989 年 5 月 15 日正式訪問中國大陸，5 月 18 日發表「中蘇聯合公報」後雙方關係恢復正常化。陳向陽，《中國睦鄰外交》，頁 215-216。

二、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關切本地區熱點問題：

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共在此問題上與東南亞國家的立場一致，強調越南應完全撤軍，並以和平談判方式解決柬國問題，贏得泰國、新加坡等國的支持；同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共則大力支持阿富汗的反抗運動。

三、透過和平談判解決邊境問題：

中共陸上的周邊鄰國有15國，海上鄰國亦有6國，因此邊界問題是中共最迫切希望儘快解決的問題，如此才能在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下，致力發展其國內經濟。而在邊境問題上，以南海主權問題最爲嚴重與複雜，基此，中共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解決方案。[36]

四、積極對外開放，促進與鄰國的經貿往來：

依統計從1978年到1991年東協原始五國在中共的投資金額即達10億多美元；而中共在東協國家的貿易總額也從1978年的8.6億美元，增加到1991年的79.6億美元。[37]除此外，中共與俄羅斯、日本、韓國間經貿往來，亦是相當熱絡，其他如：蒙古、南亞的印度、中亞國家等，與中共的經貿往來也都非常密切。

不過在中共逐步推動睦鄰外交之際，1989 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卻對中共內部政治情勢及經濟改革造成重大衝擊，西方國家連手對中共發動制裁措施，而中共爲了尋求政局的穩定，以及化解西方國家經濟制裁的壓力，開始積極尋求其他地區的市場，這促使中共更加大力推動睦鄰外交工作，加緊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38]同時在外交工作上特別強調要注意三大方向：處理好與大國、周邊國家以及第三世界之間的關係。

參、江澤民主政階段

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拔擢江澤民出任中共總書記，但在鄧小平退居幕後的5年間，江澤民的外交政策基本上仍是蕭規曹隨。1992年鄧小平南巡，表示「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39]鄧的講話爲六四事件後，瞻前顧後的改革注入了強心劑。所以綜觀經歷六四事件與蘇聯瓦解後，中共改革開放並未改變，國際環境的巨變沒有改變北京的經濟發展戰略，而是針對新的情勢，設法調整外交步伐，改善對西方關係，強化睦鄰政策，更積極與國際體系接軌。

---

[36] 宮少朋、朱立群、周啓朋主編，《冷戰後國際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年），頁 227。
[37] 陳向陽，《中國睦鄰外交》，頁 224。
[38] 許志嘉，〈中共睦鄰外交政策：意涵、策略與運作頁 3。
[39]《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372。

1997年鄧小平去世，江澤民完全主政後，中共對外政策改採積極作爲，提倡「新安全觀」，[40]加強與大國關係，實行「睦鄰友好」外交政策。[41]而在全力發展經濟目標的指導下，江澤民把睦鄰外交提升其戰略高度，當年9月中共召開十五大，開啓江澤民時代。在大會工作報告裡論及外交政策將睦鄰外交列爲優先：

（一）多極化趨勢有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繁榮。

（二）反對霸權，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三）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以平等互利爲原則，同各國開展貿易往來、技術合作與科學文化交流。

（四）各國有權選擇符合國情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反對干涉他國內政。

（五）堅持睦鄰友好的外交路線。

（六）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發揮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中的作用。

並表示，「中國的發展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今後中國發達起來了，也永遠不稱霸。」

事實上，江澤民在 1991 年 7 月 1 日，中共建黨 70 周年的講話中，提到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時，便強調要保持和發展周邊國家睦鄰友好關係，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42] 1992 年底，更提出「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十六字方針，成爲中共對外關係（針對美國）發展的指導原則。[43]而在對東協的外交上，中共的目的希望可以減弱東協國家對「中國威脅論」的感受，降低其對中共交流之抗拒，因此在南海主權問題上，提出「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和平解決、共同開發」的原則，以便換取與東協更大的戰略合作。很明顯地，後冷戰時期中共對東南亞國家的外交策略，已經體認到「和平共存、經濟合作」形成互賴互利共同體是戰略上策、搞衝突對抗是中策、而戰爭則爲下策。

---

[40] 「新安全觀」概念是中共於 1996 年所提出的，內涵爲「互信、互利、平等、協作，以對話增進互信，以協商化解矛盾，以合作謀求穩定」的安全建構。具有幾個要件：（一）超越了傳統單邊安全的「共同安全」概念，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二）具有「合作安全」的內涵，即以合作求安全；（三）國家的安全不再是單一面向的，而是綜合性的，不只包括軍事和政治安全，也擴展到經濟、科技、環境和文化等非傳統安全的領域；（四）與「綜合安全」相關，強調非傳統安全的重要性。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東亞研究》，第 35 卷第 2 期（2004 年 7 月），頁 18-23。

[41] 林麗香，〈外交政策與作爲〉，收錄《大陸研究與兩岸關係》，趙建民主編（台北：晶典文化，2005 年），頁 170。

[42] 江澤民，《江澤民論有中共特色社會主義》，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專題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527。

[43] 江澤民，《關於中國與西方主要國家的關係（一）》，中國台灣網，2001 年 4 月 17 日。http://www.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2001766/Uadmin/A2056316.html.

基於此考量90年代初期，中共對東協國家加強外交關係，除了透過經貿與科技的合作外，還透過以下三種作法：

（一）領導高層頻頻出訪東南亞國家，以增進雙邊關係發展。

（二）積極參與區域組織，加強與東協國家之雙邊或多邊的對話，1991年加入亞太經合會（APEC），1993年參與東協區域論壇（ARF），以及1996年亞歐高峰會（ASEM），和東協國家保持密切關係。

（三）倡議「新安全觀」，強調綜合安全的概念，透過與東協各國的合作，在「互信、互利、平等、互惠」的原則下，推動世界多極化發展，以建立符合中共期待的國際秩序。[44]

此外，1997年8月中共總理李鵬訪問星、馬兩國時，其所發表的演講最能代表中共對東協的外交立場。在新加坡以「加強互利合作促進共榮」爲題，強調中共市場蘊藏無限商機，許多產品與技術契合東協國家的需要，可以達到截長補短互利合作，以及共謀發展的目的。[45]在吉隆坡則以「發展面向21世紀的睦鄰友好關係」爲題演說，表達中共與東協利益是一致的，要一起抗衡美、日的勢力，以成爲東亞的主體，更強調亞洲化的價值。

綜觀來看，江澤民及其領導高層，自1992年以來，一共走訪了將近30個國家，[46]其中有一半是其周邊鄰國，主因即在於一方面中共需要一個穩定的周邊國際環境，以利其從事內部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則可以增進與鄰近國家互動，鞏固其東亞區域大國地位，防止美國再度聯合東亞國家對中共進行圍堵政策，因此東南亞區域正是中共發展睦鄰外交的重點國家。而近年來，中共積極參與東亞各項事務運作與合作機制，例如：東協、東協區域論壇、東協加一、亞太經合會等，且隨著中共經濟實力成長、市場吸引力擴大因素，在地區間地位逐漸提升。1998年江澤民在提示外交工作要點時，強調「一手抓外交，一手抓出口，打好兩條戰線的戰役，一方面展開全方位的積極外交攻勢，化解西方對中共的政治經濟壓力，另一方面則以出口創匯作爲國內經濟穩定增長的支點，保障國內整體經濟不受或少受金融危機的衝擊。」這種以外交和經貿「二合一」的策略，正是中共打開新外交格局的作法，並將使其對東協的外交，變得更加務實與現實。[47]

---

[44] 陳向陽，《中國睦鄰外交》，頁 126。

[45]《台灣時報》，1997 年 8 月 27 日，版 11。

[46] 邱坤玄，〈中共高層領導出訪的意義與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12 期（1999 年 12 月），頁 9。

[47] 宋鎮照，《台海兩岸與東南亞－三角政經關係之解析》（台北：五南出版社，1999 年），頁 83-84。

肆、胡錦濤主政階段

2002 年中共舉行的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上，胡錦濤、溫家寶等新集體領導正式接班，在十六大工作報告中強調要「繼續加強睦鄰友好，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加強區域合作，把同周邊國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48]這是中共首度提出「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論點，強調並深化了睦鄰外交政策的理論基礎。

在改革開放漸有成效，中共整體國力提升條件下，為尋求、建立本身於東亞區域之定位，開始積極與其周邊各國發展經貿關係；1997年在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共提出人民幣不貶值聲明，並向韓國、泰國等鄰國提供數十億美元援助，協助各國度過危機或免於遭到更具衝擊下，使得亞洲各國對中共的印象隨之改觀，消除了部分「中國威脅論」的疑慮；[49]2002年中共與東協簽署「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預計在2010年前建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2003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出席東南亞國協系列峰會時，提出「睦鄰、安鄰、富鄰」[50]的政策內涵，把睦鄰與安鄰、富鄰概念相結合；此外還實施「亞洲減債計畫」，免除越南、寮國、柬埔寨、緬甸以及阿富汗等六個債務國的部分或全部債務，並從2004年起，對寮國、柬埔寨、緬甸的大部分商品提供「零關稅」待遇。[51]

總之，冷戰後中共積極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尋求加入區域性合作組織，以擴大其政經影響力；[52] 在政治上，與周邊國家發展睦鄰合作、友好平等、合作關係，以利於其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在安全方面，促進區域合作、和平解決爭端，與各國進行的對話交流；在經濟方面，和周邊國家發展更密切的經貿互動，促進與東南亞各國關係的改善。[53]基此，中共以睦鄰外交及新安全觀，加緊深化及推動建構一個符合自己利益，也符合區域利益的區域安全體系，以期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來致力於經濟發展。

---

[48]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02 年 11 月 18 日。http://news3.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96.htm.

[49] 童振源，〈人民幣短期內不應該貶值，長期則視國際經濟局勢而定〉，《經濟前瞻》，第 60 期（1998 年 11 月 5 日），頁 33-35。

[50] 裴遠穎，《中共外交理論的基石》，2004 年 3 月 2 日。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2004-32-200432-world3.htm.

[51] 吳玲君，〈中國與東亞區域經貿合作：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係〉，《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5 期（2005 年 10 月），頁 12-19。

[52] 王酈久，《睦鄰思想傳統與當代中國睦鄰外交》，2004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moscity.com/news/view.asp?id=278.

[53] 許志嘉，〈中共睦鄰外交政策：意涵、策略與運作〉，頁 6。

第二節　睦鄰外交理論意涵

進入後冷戰時期，維持一個有利於中共經濟發展的和平、友好之國際環境，已成爲中共國際戰略和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中共實施的是一種全方位的外交戰略，此戰略有兩個重點：

（一）維持並發展和發達國家的合作關係。

（二）保持良好的睦鄰關係，也就是說，與周邊國家和世界大國維持友好合作關係，成爲中共外交戰略的主要核心。[54]

冷戰結束後，國際體系從原來的美蘇的兩極對抗轉爲以美國爲首，但俄羅斯、中共、日本及西歐等強國並重之多極體系，中共對於新世界秩序有新的認識：

（一）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主導全球事務。

（二）核武已經失去其重要性。

（三）國際事務不只包括安全議題，經濟議題的重要性。

（四）國際性與區域性的組織將在國際事務上扮演重要角色。

由於在國際體系中經濟議題逐漸取代軍事議題，區域性組織日漸扮演重要角色；再加上中共內部正進行經濟改革需要廣結善緣，因此中共遂改變其僵硬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改以具有彈性的睦鄰外交政策，[55]其意涵爲：

（一）中共不再堅持社會主義的路線而採取更理性的實用主義，即中共不再犧牲自己的利益來成就社會主義。

（二）中共了解其在冷戰後在兩強之間的平衡地位已經消失，而經濟在外交領域日漸重要。

（三）中共將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及國際組織。

（四）中共睦鄰外交的首要工作便是加強與亞太國家之間的合作。

對中共而言，睦鄰外交的戰略就是要建構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而中共睦鄰外交的政策內容，即是要從化解爭議、促進合作兩個大方向著手。以下區分四點說明之：

一、和平解決邊境糾紛，改善周邊關係

由於中共的鄰國眾多，因此在與周邊國家的糾紛中，邊境領土主權問題乃

---

[54] 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北：生智文化，2004 年），頁 246。

[55] 蔡增家，〈冷戰後中國對東協的外交政策〉，《中國大陸研究》，41 卷 9 期（1998 年 9 月），頁 77-78。

是最重要的衝突議題，也是中共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1997 年在中共十五大後，和平談判成爲其積極改善周邊關係的重要方向。

表 3－1 中共陸地疆界接壤統計表　　（單位：公里）

鄰國	疆界長度	鄰國	疆界長度
北韓	1,416	巴基斯坦	523
俄羅斯（東北）	3,605	印度	3,380
蒙古	4,673	尼泊爾	1,236
哈薩克	1,533	不丹	470
吉爾吉斯	858	緬甸	2,185
塔吉克	414	寮國	423
俄羅斯（西北）	40	越南	1,281
阿富汗	76	總長度	22,153

資料來源：CIA World Book；胡元傑，「中共在中亞之外交戰略」，2005「知青新思維」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主辦，（2005年10月8日），頁340。

基本上，中共的邊境領土爭議可分爲三大類：陸地邊界爭議、海上邊界爭議與未收復的國土爭議。[56]茲分述如下：

（一）陸地邊界爭議

陸地邊界爭議有二種，一是早期遺留下劃界不清的問題，由於中共的周邊國家在過去多是中國的藩屬國，故在邊界問題不敢與中國有所爭論，但在西方國家介入後，如：越南、蒙古、緬甸等國便產生了爭議；二是原本的劃界問題就不清楚，如：俄羅斯、印度等國。綜觀來看，俄羅斯、越南和印度是與中共領土爭議較嚴重的國家。

在與印度爭議的領土部分，冷戰結束後，中印於1993年簽署「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1995年雙方撤除邊境東段過於接近的哨所，1996年11月江澤民訪問印度時，彼此簽署「關於在中印邊境實控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2003年6月印度總理瓦傑帕伊訪問中共，雙方再度重申願意通過平等協商解決邊界問題，並各自任命特別代表，和平

[56] 許志嘉，〈中共睦鄰外交政策：意涵、策略與運作〉，頁 7-8。

協商解決之道。[57]至於與原蘇聯爭議部分，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後，新獨立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及俄羅斯等國，均分別與中共透過談判方式和平解決紛爭。

中共與越南有爭議的領土邊界是最爲複雜的部分，主要有三方面：陸地邊界、北部灣劃分以及南沙群島及附近海域主權爭議。由於中越雙方已於1999年12月在河內簽署「中越陸地邊界條約」；2000年12月簽署「關於在北部灣、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劃界協定」；[58] 2005年11月胡錦濤至越南訪問，雙方決定在2008年以前完成1300公里陸上邊界戡定工作，[59]這使得中越間領土爭議，已解決其中兩項，至於南海各群島爭議部分則仍待持續協商。

（二）海上邊界爭議

海上邊界爭議有三個：（一）與越南的東京灣（中共稱北部灣）等海上邊界；（二）與日本的釣魚台問題；（三）南海問題；此部分中共採取的政策是「擱置爭議，主權屬我，共同開發」之態度，期望降低爭議點熱度。由於北方與日本的釣魚台爭議仍未完全解決，而南方的南海主權爭議，尚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等相關國家還未找到解決方案。[60]基本上中共雖一再強調採取雙邊協商談判及多邊合作協商機制來解決海上邊界，尤其是南海問題爭議，但仍受到區域國家的質疑。

（三）未收復的國土爭議

未收復的國土爭議係指台灣問題解決而言，中共強調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式，透過協商解決問題；但台灣本身內部即存有不同意見，又爲國家主體（與香港、澳門模式不同），此外尚涉及美、日及周邊國家的政治角力與戰略佈局等因素，現僅能就如何增進兩岸瞭解，消除彼此歧見、對立，建立和平合作氛圍著手。

另外寮國、北韓和不丹三國與中共間沒有領土問題爭議，至於與蒙古、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國間，皆已於60年代在中共的妥協讓步下，解決不嚴重的領土爭議問題。[61]

---

[57]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印「雙邊關係」》， 2005 年 7 月 4 日。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yzs/gjlb/1328/default.htm.

[5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越「雙邊關係」》， 2005 年 7 月 4 日。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yzs/gjlb/1338/default.htm.

[59] 蘇長和，〈周邊制度與周邊主義－東亞區域治理中的中國途徑〉，《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 年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0。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1116.

[60] 1988 年 3 月 14 日中越曾發生赤瓜礁事件，1989 年 6 月越南又侵占南沙群島多個島礁，目前越南占領有 27 個，菲律賓占有 8 處，馬來西亞占領 4 個，汶萊則僅 1 處。陳向陽，《中國睦鄰外交》，頁 222。

[61] 1961 年 10 月 1 日簽訂「中緬邊界條約」；同年 10 月 5 日簽訂「中尼邊界條約」；1962 年 12 月 26 日簽訂「中蒙邊界條約」；1963 年 3 月 2 日簽訂「中巴關於中國新疆和巴基斯坦實際

二、建立雙邊對話機制，參與多邊外交，提升夥伴關係

中共與周邊國家政治關係的改善，是解決紛爭、促進合作、推動睦鄰外交的重要工作。90年代以後，中共以建立各種形式的夥伴關係、合作關係、參與多邊外交機制，來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例如：與俄羅斯、美國、日本、東協、南韓、印度、巴基斯坦、哈薩克、蒙古等國家，都建立了各種形式的夥伴關係。

對中共而言，建構各式夥伴、合作關係的原因，一是爲了確保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以追求中共的現代化；二是爲了促進國際體系多元化，並期望建立一個新的戰略觀與意識形態，以支持其作爲世界重要一極的新地位。[62]因此，中共與周邊國家夥伴關係、合作關係的建立，已成爲其推動睦鄰外交的重要形式。

（一）建立雙邊對話機制

中共對東協的雙邊關係，係透過四個對話機制來進行，包括：中共與東協高級官員政治諮商會議（China-ASEAN political consultation at seniorofficial level）、中共—東協經濟、貿易合作聯合委員會、中共—東協科學技術合作聯合委員會、東協－北京委員會。[63]另外，中共與東協還設立一個「中共與東協合作基金」（ China-ASEAN Cooperation Fund），承諾保證捐款70萬美元供運作。

（二）參與多邊外交

多邊外交基本上是指三個或三個以上的國家或實體共同參與的外交活動，多邊外交主要的互動形式包括：多邊同盟關係、國際組織、國際制度、多國元首會議等。其中，國際組織被視爲多邊外交活動之中最重要的形式，不過無論是透過何種形式的互動，國際間的多邊外交非常重視多邊機制的作用，也就是說，多邊外交的推動需要經由一定的規則與作用機制，才能有助於多邊外交的有效推動和穩定發展。隨著全球化趨勢，多邊外交日益受到重視，但長期以來，中共對於由美國及西方國家推動的國際建制，保持懷疑和排斥的立場，雖然中共早期曾參加第三世界國家主導的多邊合作機制，但基本上對於多邊外交的參與一直不深也不積極。

直到冷戰結束後，中共才開始出現觀念和行爲上的改變，開始強調並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機制，並從中找到自己的利益。具體表述即是在中共的十五大報

控制其防務的地區相接壤的邊界問題的協定」；同年 11 月 22 日簽訂「中阿邊界條約」等。劉宏烜主編，《中國睦鄰史－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頁 22。

[62] Joseph Y. S. Cheng and Wankun Zhang, “Patterns and Dynamic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Behavi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31, No 11（2002）.

[63] 〈東盟與中國關係大事紀〉，新華網。http://www.xinhua.org/ssjj/zrjcf/files/b2.htm。

告中，江澤民指出，「要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充分發揮我國在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中的作用」。[64] 對中共而言，透過多邊外交的推動既有利於中共自己的國家利益，也可以爲中共在國際社會上樹立正面形象，擴大其國際影響力。[65] 中共主要以聯合國爲舞臺，將亞太（特別是東亞地區）列爲重點，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66]到目前爲止，中共參與的多邊國際制度涉及安全、金融、貿易、環境、人權等各個領域。而中共學者蘇長和指出「周邊制度」，可用來介定中共與周邊國家，在近十多年來，就諸多公共問題在治理時，所形成的正式與非正式制度安排，並將之區分如下表：[67]

---

[64]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1997 年 9 月 12 日。http://news3.xinhuanet.com/zhengfu/2004-04/29/content_1447509.htm.

[65] 許志嘉，「中共睦鄰外交政策：意涵、策略與運作」，頁 9-10。

[66] 宮力、孫相東，〈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戰略取向〉，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2005 年 12 月。http://www.idcpc.org.cn/globalview/zjlt/37.htm.

[67] 隨著 1979 年中共對外開放政策的展開與深入，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逐漸由 1949 年至 1979 年的自主型轉爲相互依賴型。在相互依賴關係中，就中共與周邊國家關係而言，區域公共問題逐漸成爲中國外交中的重要議程。在中國與周邊國家合作治理區域公共問題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由中共發起，與相關周邊國家一起共同達成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周邊制度安排」。蘇長和，〈周邊制度與周邊主義－東亞區域治理中的中國途徑〉，頁 12。

表 3－2 中共的周邊制度安排

議題	正式的制度安排	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政治	「中共－東協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	東亞峰會；中國與東盟首腦與部長級會談；東盟地區論壇及其對話夥伴國
安全	上海合作組織	六方會談機制；中共－東協「南海各方行爲宣言」；「中國與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及「諒解備忘錄」；中、日、韓安全對話
經濟	雙邊貨幣互換的「清邁協定」；「中國－ 東協自由貿易」； 亞太經合會（APEC）；CEPA	博鰲亞洲論壇與東亞展望小組會議；圖們江區域合作；中亞自由貿易區倡議；東北亞自由貿易區倡議；大湄公河區域合作；中國邊省與周邊國家的各類邊境經濟開發區
環境	大湄公河次區域環境合作機制（次區域生物多樣性保護走廊）	東北亞環境合作年度會議；中、蒙、日、韓、朝防治沙塵暴工作小組；東亞海域環境管理區域專案組織；西北太平洋行動計畫；東亞海域行動計畫；南中國海專案
疾病控制	中共－東協傳染病檢測、檢疫、控制合作	「10＋3」公共衛生合作機制；「10＋3」衛生部長會議
跨國犯罪	上海合作組織	東協與中、日、韓打擊跨國犯罪合作機制（部長級）
毒品貿易	上海合作組織；「東協－中共禁毒行動計畫」	中、柬、老、緬、泰、越有關禁毒合作的「北京宣言」；中、老、緬、泰、印5國合作機制

資料來源：蘇長和，〈周邊制度與周邊主義－東亞區域治理中的中國途徑〉，《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1期，（2006年1月），頁13。

不過當前，中共在倡導建立東亞區域性多邊安全機制的過程中，仍面臨著以下的困難：1.與東南亞相關國家的海上劃界問題仍沒有結果；2.台灣問題；3.朝核問題；4.中、日政治關係；5.能源問題等，[68]都尚待中共與周邊國家，持續透過多邊外交機制協商與解決。

[68] 任晶晶，〈東亞多邊安全機制：中國的困難與選擇〉，《今日世界》，2005 年第 10 期（2005 年 10 月），轉引自中國國關在線網。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1111.

（三）提升夥伴關係

目前中共與各國及重要國際組織，建立了各種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可區分爲：「戰略性」、「合作性」、「睦鄰友好」三種類型。其中有關中共與東協國家建構睦鄰友好關係之類別，將於下一章再作說明，至於與非東協國家之戰略性、全面合作、睦鄰友好等關係之建立，則如下表：[69]

[69] 般天爵，〈中共『大國外交』與『夥伴關係』之研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3 期（1999 年 3 月），頁 85-86。

表 3－3 中共夥伴關係一覽表

關係	國家	名　　稱	建立時間
戰略夥伴	俄羅斯	面向21 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1996年
	美國	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	1997年
	印度	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2005年
	哈薩克	戰略夥伴關係	2005年
合作夥伴	北韓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	1961年
	巴基斯坦	面向21世紀的中巴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1996年
	加拿大	全面友好合作夥伴關係	1997年
	法國	長期全面夥伴關係	1997年
	墨西哥	跨世紀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1997年
	英國	全面夥伴關係	1998年
	歐盟	全面夥伴關係	1998年
	日本	和平發展的友好夥伴關係	1998年
	南韓	面向21世紀的中韓合作夥伴關係	1998年
	美國	建設性合作關係	2001年
	印度	長期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	2003年
	南亞	長期穩定睦鄰友好關係	1996年
	尼泊爾	面向21世紀的世代友好的睦鄰夥伴關係	1996年
	蒙古	面向21世紀長期穩定、健康互信的睦鄰友好合作關係 睦鄰互信夥伴關係	1998年 2003年
睦鄰夥伴	塔吉克	面向21世紀的睦鄰友好合作關係	2000年
	阿富汗	睦鄰友好宣言	2002年
	吉爾吉斯	中吉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2002年

資料來源：許志嘉，〈中共睦鄰外交政策：意涵、策略與運作〉，全球化與中共發展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2005年12月25日），頁16-17。

1.戰略夥伴關係：並非軍事同盟，而是以各層面的共同平行利益爲基礎，謀求長期性的合作。例如：與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關係，雙方可進行政治、軍事、經濟等各層面的合作關係，尤其是在國際事務上，中俄雙方對許多問題多採一致立場，積極推動國際權力多極化之進程，共同反對霸權主義；與美國之間，則爲局部性與期盼性，雙方僅能在互利之處合作，至於在分歧之處，則多保留各自立場，往往以「求同存異」或「各說各話」方式，維持雙邊友好合作關係。

2.合作夥伴關係：係指一些沒有特殊分歧、也沒有特殊利益的國家，包括法國、英國、日本、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國，雙方可進一步合作者，此乃目前中共與各國簽訂最多協議之模式。

3.睦鄰友好夥伴關係：則是針對中共周邊鄰國之睦鄰外交作爲，以營造有利於其經濟發展與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

中共在建立夥伴關係時，會依其建立目的，如：對方國家的權力強弱、區域層次之差異、化解領土爭議等因素，而將夥伴關係之程度有所區隔。[70]不過，從中共努力建設與非大國的夥伴關係中，更可發現中共積極以此新型雙邊關係之推廣，做爲強化多極、制衡單超的全球佈局。

三、加強安全合作交流

冷戰後，中共積極擴大與亞太周邊各國的安全合作，積極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大力推動軍事外交和建立信任措施等合作模式，與有關國家達成了一系列協定或共識。其方式如：防止武器擴散、防止軍備競賽、防止核擴散、打擊恐怖主義、防止非法武器交易等，並藉由信任措施以增加其軍事透明度，如：軍事互訪、建立領導人定期戰略對話制度、設立熱線、事先通報軍事演習、進行邊界裁軍等，與周邊國家建構合作交流機制等。[71]

除了上述合作方式外，中共與東亞國家在武器買賣的部分，亦相當受人矚目。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就長期且免費的向亞洲友好鄰國提供武器，其中最主要的是向北韓、北越、巴基斯坦等國輸出武器，而此一政策一直持續到鄧小平執政後才停止。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從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共人民解放軍開始建立了擁有數千商業公司、以軍事爲基礎的經商網絡，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寶利集團公司、解放軍總後勤部的新星公司、解放軍總政治部經營的凱利有限公司、由空軍、海軍和國防科工委所經營的商業公司等。而中共軍售的增長，有著長期和短期的目標，就長期而言，可爲中共提供在區域

[70] 施子中，〈中共推動大國外交與建構夥伴關係之研析〉，《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1 卷第 3 期，（1999 年 7 月），頁 10-12。

[71] 閻學通，《中國與亞太安全》，（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 年），頁 25-27。

和全球事務建立政治影響力的基礎；就短期來看，這些武器銷售能爲中共軍隊現代化提供經濟來源。[72]

自80年代中期以後，中共以其低廉的武器售價，成爲開發中國家的第三大武器供應者。以泰國爲例，原本是向美國採購主要武器裝備，但現在已逐年擴大向中共購買武器，不僅包括輕型的武器，還包括重型及高科技武器。此外中共與緬甸的軍事關係也非常密切，並幫助緬甸修建了一條由雲南銜接到仰光的公路及橫跨伊洛瓦底江的大橋，藉此中共的軍事物資及人員，可直接由雲南經由緬甸而進入印度洋；從1987年到1991年間，中共已超過英國，成爲在美國、蘇聯、法國之後的全球第四大武器出口國。[73]現中共在東南亞地區，已和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和緬甸等國，積極發展軍事合作關係（包含武器買賣），目前東南亞的泰國、越南、緬甸及柬埔寨都是中共軍火的主要購買者，這四國與中共的軍事合作關係相當密切。[74]

四、推動經貿互動關係，加強經貿合作

冷戰後，中共積極對東協推行「經濟外交」，首先，中共從雙邊經貿和各類合作的角度著手，再提出成立自由貿易區協議，以贏得東協國家的支持。基此，中共從1999年以來分別與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緬甸六國簽署雙邊合作聯合聲明，以作爲發展雙邊關係的架構和目標。而中共與各國之聯合聲明，大抵上是依據對手國的國情以及與中共的關係程度，訂定出將來預計發展關係的層次和形態，因此中共與各國簽訂的聯合聲明主軸大致相同，但內容和重點則或多或少稍有差異，且多數已在進行中。[75]

2002年「中共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簽署後，計劃於2010年成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將創造一個擁有17億人口、近2萬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達1.2萬億美元貿易總和的經濟區。按人口計算，這將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從經濟規模上看，亦是發展中國家間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其規模僅次於「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是世界第三大自由貿易區。[76]

目前，中共已成爲東協第四大貿易伙伴和增長最快的市場，中共與周邊國家的經濟關係，除參與「東協＋1」、「東協＋3」和東亞共同體外，其主要措

---

[72]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年），頁 151。

[73] Tai Ming Cheung，〈人民解放軍公司，中國軍隊發動謀利的進攻〉，《遠東經濟評論》（1993 年 10 月 14 日），頁 64-71。

[74] 顧長永，〈中共與東南亞的政治經濟關係〉，頁 2-3。

[75] 陳鴻瑜，〈中共對東南亞「經濟外交」之成效與展望〉，和平論壇，2004 年 11 月 25 日。http://www.peaceforum.org.tw/onweb.jsp?webno=333333330;&webitem_no=991.

[76] 韓鋒，〈中國『睦鄰、安鄰和富鄰』政策解讀〉，《中評月刊》，第 98 期（2006 年 2 月）。http://gb.chinareviewnews.com/zpyk/HistoryArticle/20060303.htm.

施：（一）「早期收獲」計劃；[77]（二）參與亞太經合會（APEC）；（三）湄公河流域的合作發展計畫；（四）免除柬埔寨、老撾、緬甸和越南等國到期債務；（五）在「上海合作組織」中加入經濟合作的內容；（六）成立「博鰲亞洲論壇」等。凡此，均顯示出中共運用各種多元方式，積極建構有利於其經濟發展之周邊機制和環境。

第三節　小結

然而我們要注意到的是，一方面中共固然以「和平穩定」爲外交戰略中的主要觀念，另一方面從江澤民掌權以後，中共國家利益也隨著面臨「多極化」而有所調整，例如後冷戰時期美國成爲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並更加單邊執行美國利益爲導向的國際秩序；然而另一方面，包括如同中共一般的區域強國，也不甘服從於美國所主導與建構的國際共同觀念與秩序，國際社會屬於物質力量板塊，於是形成一個多格局的情境；中共因改革開放累積綜合國力後提升自信與國際威信，以及國內共產主義的式微與民族主義的高漲，自江澤民以來的外交戰略也有所調整，而這自然會影響中共睦鄰外交戰略的方向。如果說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是立足在第三世界，而與美蘇兩強進行「和戰」的兩手策略，那麼鄧小平的國際戰略則是站在發展中國家立場，對外採取「避戰」的戰略。相對於毛、鄧，江澤民則是以更強的物質實力與美國互動，並試圖突破美國潛在的戰略圍堵、逐步挑戰美國在東亞的超強地位。

時至目前爲止，中共仍以睦鄰外交爲主要周邊政策，因爲沒有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中共既無立足東亞的基石，也就無從展現其樞紐位置；因此，中共既然要建構出對自己國家利益有利的國際共同觀念，仍舊必需持續發出和平的訊號，而「睦鄰外交」的宣示與實踐的情況、使得合作的層面與對象也在不斷的深化與擴大，而這樣的不斷的交往是否徹底讓「和平」的觀念深化到中共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文化、這關係到中共性格究竟抉擇霸道或王道的意識比例、也讓觀念結構的制約性是否爲關鍵能夠有驗證的機會。

中共睦鄰外交思想既繼承了中國古代「以善待鄰」的優良傳統，又因爲中共了解自我的落後，而逐漸克服了歷史上與鄰國關係中，長期存在的大國主義心態，將平等對待鄰國的精神融入自我的觀念中；然而「我們黨和國家歷代領導人始終把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放在國家利益的第一位，視爲中共在任何時候

[77]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計劃財務司（外經貿部計財司），《中國與東盟外經貿統計資料》（2002 年），頁 6-7，http://gb.chinareviewnews.com/zpyk/HistoryArticle/20060303.htm.

都必須加以維護的最爲根本的利益。」[78]在重大問題上仍然不妥協，不讓步，堅決捍衛中共自身利益與權益；換言之，一方面在顧及經濟發展的需求解決上與鄰國的利益分歧上，表現出相當的靈活性，一方面顧及中共國內脆弱的民族情緒與中共政權統治的合法性而有不可退讓的底線；換言之，中共一面保護自己國家的利益，又盡力整合自身與鄰國的利益，並在結合利益的過程中，以透過中共傳統意識形態的觀念，尤其是王道思想的體現，調和彼此的各自國內利益，透過觀念層面的整合，朝共利、而非爭利的方向發展。

綜言之，2003 年中共就國際形勢作出三大判斷：（一）單極和多極矛盾加深，並成爲國際社會矛盾的焦點；（二）國際恐怖主義勢力抬頭，國際反恐鬥爭任務艱鉅；（三）世界經濟緩慢增長，更加廣泛的國際合作和更加激烈的競爭關係並存。[79]鑑於此，中共中央就 2004 年外交工作布局指示，「大國外交是關鍵、周邊外交是首要、發展中國家外交是基礎」。[80]具體而言，把發展與周邊國家關係放在首位， 希望通過區域組織建設和經濟合作等方式，全面提升與周邊國家的關係。

對中共而言，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是深化與世界各國，特別是與發展中國家雙邊關係的重要策略。[81] 1997 年江澤民在第一次東亞高峰會上宣布「中國將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發展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和全球多邊貿易體系」，2000 年 9 月在聯合國領袖會議中表示「應在平等的基礎上推進南北對話，同時應廣泛開展南南合作。…必須爲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各國應消除形形色色的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相互開放市場。應切實減免發展中國家所欠的債務，增加對他們的不附加條件的官方援助。…各國都應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則開展經濟貿易技術的交流和合作，以共享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的成果」。[82]

中共的策略考量不外乎以下幾點：[83]

一、深化與各國（特別是與開發中國家）雙邊關係：

透過區域經濟合作，鞏固政治友好關係，加強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南南合作」，符合中國大陸政治、外交和安全上的利益，爲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良好

---

[7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3 年），頁 570。

[79] 賴昱安，〈和平崛起：大國外交與睦鄰戰略〉收錄《胡溫體制的平衡戰略－思維與政策》，朱新民主編。（台北：遠景基金會，2005 年 3 月），頁 204。

[80] 〈敦親睦鄰，中共今年外交首務〉，《中國時報》，2004 年 1 月 29 日。

[81] 石廣生，〈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中國宏觀經濟資訊網》，2002 年 5 月 31 日。http://www.macrochina.com.cn/info.shtml.

[82] 江澤民，〈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江澤民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07-112。

[83] 賴昱安，〈和平崛起：大國外交與睦鄰戰略〉，頁 205、206。

的國際環境。特別是藉由「南南合作」，增加開發中國家集體的談判籌碼，以打造一個「公正、公平、全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二、爭取區域主導權：

利用各國希望進入中國市場的動機，爭取自己在談判中的主動優勢地位；特別是面對美國可能在東亞逕行的單邊軍事主義，以及對中共潛在的軍事防堵，中共希望藉由自己經濟實力的提升，加重自己對亞太事物的發言分量，避免中國與鄰國關係一味地受制於美國的壓力。

三、擴大國際經濟的影響力：

通過擴大市場規模以提高對國際經濟的影響力，在與區域外其他經濟體發展經貿關係時擁有更強的競爭力，並在世界多邊貿易體制中掌握更多的籌碼。

四、針對周邊國家推行睦鄰外交政策方針，強調共同安全與共同發展的理念：

中共「全方位」區域經濟策略將擴大其全球經貿關係網路，改善周邊環境，消除中國威脅論的負面影響。

五、抵禦全球化帶來的風險：

透過區域經濟合作，中國大陸可藉由與其他國家經濟政策協作與配合，築起防範風險的第一道防波堤，共同抵禦來自區域外的各種衝擊。

六、藉由睦鄰外交遏制臺獨，壓縮臺獨勢力的國際空間：

經濟上，強調雙贏與多贏的經濟互利互補合作利益，塑造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並斷絕臺灣金錢外交的出路；政治上，藉由與周邊鄰國的政治友好關係，使鄰國堅持「一中原則」；國家安全方面，說服各國「臺獨」對區域和平構成威脅，是中國與鄰國的共同敵人，避免鄰國支持臺獨勢力。[84]

在中國與東協的關係方面， 1997 年中共與東協建立睦鄰互信夥伴關係後，雙方即開始透過「東協＋1」、「東協＋3」的機制，強化中共與東協的經貿往來，2004 年在建立自由貿易區談判議題上更具突破性發展。在 11 月寮國首都永珍所舉行的第八屆東協元首高峰會議及第六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中，中共與東協簽訂了多項協議，全面啓動建立自由貿易區的程序，可說是中共「經濟外交」的典範。更重要的是，中共將「一個中國」的原則法律文件化，取得了東協國家第一次以集體的方式，以「東協」正式的文件對外發布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承諾。[85]雖然中共與東協國家仍存在南海主權爭議，及國際經濟分工上的競爭，面對雙方超過 1,000 億美元的雙邊貿易額及 36.2%的貿易成長速度、彼此

---

[84] 蔡宏明，〈臺灣開展全球策略聯盟佈局的挑戰與對策〉，《行政院經濟委員會之研究計畫》（1994 年 10 月），頁 35、36。

[85] 《ASEAN 官方網站》 http://www.aseansec.org/16749.htm

在反恐、區域穩定與發展等共識下，雙方更趨緊密的夥伴關係是可預期的。

歸納文化與物質結構對中共睦鄰外交的影響具有下述內涵：

一、擯棄冷戰思維，以新安全觀處理與鄰國的分歧：

90年代初，隨著蘇聯解體，以兩超對抗爲特徵的冷戰宣告結束，但是以大國對抗、軍事睦鄰、突顯意識形態對抗、積極謀求霸權爲特徵的冷戰思維依然存在。中共做爲一個有著眾多鄰國的發展中大國、與許多周邊國家還存在邊界、意識形態等大量歷史遺留問題待解決，如果依靠以實力爲基礎的冷戰思維去解決問題，必然不利於周邊地區安全和世界的穩定，中共自身也會被陷於無盡的外部紛爭而不能自拔；基於這樣的考慮，90年代中期提出了新的安全觀，通過國家間平等互利的安全和經濟合作，化解彼此間和地區間的緊張和敵意，實現雙方和多方共同安全而非單方面的絕對安全，實現綜合安全，而非單純軍事安全。中共的睦鄰外交政策提出，正是基於這一新安全觀概念下的一種具體實踐成效。

二、尊重多樣文明，通過平等對話與交流加強彼此信任與合作：

中共承認和尊重周邊國家的多樣性。2002年5月，江澤民在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指出：「充分尊重各國文明發展的多樣性，因爲它是世界存在本質特徵」。各種文明和各國的發展道路應和諧共存，在比較和競爭中可以相互取長補短，在求和存異中共同進步。國家不論大小，都應當遵循各自的歷史軌跡，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應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平等交流，友好合作。在中共的周邊國家中，從人種到信仰，從領土面積大小到自然資源多寡，從科技非常發達到經濟極端落後等，存在廣泛的多樣性，這一特點是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所少見的；加之曾經有被周邊國家所尊重甚至推崇的輝煌歷史，亦有被征服成爲半殖民地國家的屈辱記憶，故中共外交對周邊國家的感受非常重視。

三、與鄰爲善，以鄰爲伴，建立全面合作機制：

中共認爲鄰國的形成是一個自然和歷史的形成過程，並不是誰能夠自由選擇。歷史安排了鄰國，就應當與其共同生存與合作。儘管與一些鄰國間在歷史上發生過不幸，現實中也有相互誤解和利益矛盾存在，但只要本著平等協商的原則解決問題，就沒有引發對立和衝突的必然性。主張要對鄰國有誠意和善心，而要有與鄰爲伴的精神，而非鄰爲壑，與鄰爲敵。認爲相鄰國家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一些跨越國界性的問題必需要在雙方相互協商基礎上共同解決，使雙邊的問題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

四、睦鄰與富鄰相結合，參與區域一體化進程，全面提高睦鄰關係綜合效益：

中共在與鄰國發展關係中，既重視解決雙邊政治關係問題，爲兩國關係提

供可靠的和平與安全環境；也非常重視雙邊經貿合作，將它視爲穩定彼此關係的重要基礎。中共的鄰國大多數爲發展中國家，多希望通過與中共開展互通有無的經貿合作來振興本國經濟。中共雖是發展中國家，但有廣闊的市場與勞動、技術發展潛力，中共與鄰國間的進出口不僅可以促進自身的經濟發展，也能帶動周邊國家的經濟。而區域性國際合作呈現快速發展的趨勢，在周邊相繼形成了一些由不同成員國組成的區域性政治、經濟或安全合作組織，希望通過參與這些區域性合作組織，與所有鄰國共同致力於各組織所在區域及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繁榮。[86]

綜上所述，睦鄰友好合作政策是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外交政策，包含中共傳統思想中的意識形態與中共務實的政治文化精神。改革開放後的中共領導人持續這一政策，並對其不斷加以充實和完善，使之成爲與周邊國家互蒙中共成長所帶來的利益的長期政策。2003 年 10 月溫家寶總理在出席中共與東南國協領導人非正式會晤期間宣佈，中共睦鄰外交的根本是保障自身安全和發展的同時，實現「睦鄰、安鄰和富鄰」。[87]他進一步解釋這項政策說：「睦鄰，就是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親仁善鄰、以和爲貴的哲學思想，在與周邊國家和睦相處的原則下，共築地區穩定、和諧的國家關係結構。安鄰，就是積極維護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通過對話與合作增進互信，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分歧，爲亞洲的發展建構和平安定的地區環境。富鄰，就是加強與鄰國的互利合作，深化區域和次區域合作，積極推進地區經濟一體化，與亞洲各國實現共同發展」[88]，結合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建構的中共睦鄰外交，基本上遵循所謂的理性原則，而這根植於中共務實判斷自我的實力不足、因而在現階段發展國家利益的同時、了解到國際因素的制約大於自身所能主導的形勢，因此選擇中國傳統的「王道」睦鄰外交思想；然而未來當中共綜合國力達到足夠建立有利於己的國際體系文化時，將越不受國際體系文化的制約與規範，能否持續以和平思想爲主軸轉而採取本身傳統思想中既有霸道的外交思維，將成爲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另方面，中共「國家利益」與「睦鄰外交」不僅有單向指導的功能，也將發揮雙向建構的力量；即國家利益指導著外交的取向、然而「睦鄰」的和平、對等、民主等觀念，也會內化到中共的國內體質，成爲中共下一步性格轉換的趨力，未來中共國內的利益團體、民意制約也將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中扮演更爲主導的角色。

---

[86]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大使館教育處，《睦鄰思想傳統與當代中國睦鄰外交》， 2004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moscity.com/news/view.asp?id=278.

[87] 張劍荊，〈十六屆三中全會確立經濟外交路線圖〉，《財經雜誌》，2003 年 11 月 6 日。

[88] 〈溫家寶指出，發展是亞洲振興必由之路〉，《中華工商時報》，2003 年 10 月 8 日。